

# 新中国初期“留苏潮” 实录与思考

◎周尚文 李 鹏 郝宇青 编著

XinZhongguo Chuqi “Liusuchao”  
Shilu yu Sikao



著名  
上海  
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新中国初期“留苏潮” 实录与思考

◎周尚文 李 鹏 郝宇青 编著

XinZhongguo Chuqi “Liusuchao”  
Shilu yu Sikao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周尚文等编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8  
(2011 华东师大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ISBN 978-7-5617-9849-2

I. ①新… II. ①周… III. ①留学教育—教育史—中国—现代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7954 号

华东师大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

编 著 周尚文 李 鹏 郝宇青  
组稿编辑 孔繁荣  
项目编辑 夏 玮  
审读编辑 张俊玲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6.75  
字 数 32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一次  
印 数 1—1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9849-2/G·5829  
定 价 5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序言

李兴耕<sup>①</sup>

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培养国家所急需的建设人才,通过不同途径向苏联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留苏潮”,在我国现代教育史和留学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据统计,从1951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先后向苏联及东欧国家派遣留学人员约18000名,其中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含实习生)约16000名。留苏的莘莘学子怀着“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历尽艰辛,勤奋学习,大多取得了优异成绩。回国后,他们在各自岗位上辛勤耕耘,为祖国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重温建国初期的“留苏潮”这段历史,回顾这一代留苏学子走过的道路和留下的传统,总结留学生派遣工作的经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对新时期的出国留学工作、吸收海外智力资源也有很大借鉴意义。

作为50年代留苏学子中的普通一员,我亲历了留苏预备生的选拔、培训、留学生活、归国集训及分配工作的全过程。我于1953年从江苏无锡师范学校毕业后被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54年经组织推荐参加留苏预备生选拔考试。被录取后,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培训一年,主要是学习俄语。1955年夏进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五年。1960年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直至退休。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我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周尚文教授盛情邀请我为他牵头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

---

<sup>①</sup> 李兴耕同志1955—1960年留学于列宁格勒大学,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研究基地的重大课题最终成果《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作序时,我不揣冒昧接受了这一任务。仔细读完了这部书稿,我感慨万千,激起了我对留苏岁月的回忆和思考。

我的相册里保留着一张颜色发黄的老照片,那是1955年2月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4班全体同学与老师在教学楼前的合影。那时,同学们几乎每天清晨都到校园里练习俄语发音,背诵单词,朗读课文。俄语的变格和变位规则非常复杂,使我头痛不已。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学习,我初步掌握了俄语基本知识和简单会话能力。出国前,国家为我们置办了全套出国服装,其中有呢子大衣、西服、中山装、衬衣、皮鞋等,这些衣物在当时是很高档的。说实话,此前我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也没有着过皮鞋。当我领到沉甸甸的两大箱子出国服装时,深感国家对我们这批留苏学子的厚望和自己肩负的重任。

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了1955年夏天乘国际列车离开前门火车站前往莫斯科时同学们激动地齐声高唱《共青团员之歌》的声音:“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这歌声表达了留苏学子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

我还保留着一张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二十多个中国留学生1959年夏天在涅瓦河畔梅特宁斯卡亚大街宿舍楼前的合影。那时,同学们都不过二十来岁,满怀壮志,意气风发。我们初到列宁格勒时,遇到了不少困难,在课堂上听不懂老师的讲课,记不下笔记,无法流畅地用俄语与别人交谈。幸亏苏联同学及高年级中国留学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使我们得以逐步克服困难,在学习中取得较好成绩。我还想起了俄语老教师薇拉·巴甫洛夫娜的满头白发和慈祥笑容,以及她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至今没有忘记用俄语背诵她讲解过的普希金、莱蒙托夫诗篇。1958年夏天,我们与苏联同学一起到哈萨克新开垦的处女地帮助收割小麦和玉米,在那里劳动了两个多月。直到10月初,麦子被大雪覆盖,我们才回到学校。苏联政府给我们每人颁发了一枚“处女地开拓者”铜质奖章。

1954和1955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较多,选修的专业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古希腊罗马史、中世纪史、俄国古代史、苏联史、法国史、英国史、美国史、国际共运史、史学理论等。除了本系的基本课程和俄语外,各人根据专业需要还选学了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等外语。毕业回国后,同学们被分配到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其中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中共中央编译局、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单位,从事教学、科研、翻译和编辑工作。同大多数归国留苏生一样,同学们回国后走过的道路是艰辛曲折的。“文革”期间耽误

了整整十年。直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大家才得以身心舒畅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为我国世界史、苏联史、国际共运史、史学理论等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本书课题组把我们这些来自同一学校和同一专业的留苏生作为一个群体研究对象,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深度采访。我读了本书中关于这一群体的章节后,感到十分亲切和无比欣慰,受到很大鼓舞。50年代的留苏学子现在都已年逾古稀,有的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不少人仍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发挥余热。他们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

《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一书在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留苏潮”进行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全面考察。课题组全体成员把收集有关原始档案、文献资料、回忆录、访谈录和各种出版物作为研究工作的起点,展开广泛周密的调查研究,体现了一丝不苟的、严谨的科学的态度。他们先后到教育部、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市档案馆、欧美同学会和其他单位查阅了相关档案,还访问了众多留苏学生、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进行问卷调查,发掘了许多珍贵资料,其中有些文献档案首次公之于众。这些先期工作为课题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书把“留苏潮”放在从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美幼童起一个半世纪以来连绵不断的历次留学运动历史背景下,展开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探讨“留苏潮”兴起的动因、进程、特点、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本书不仅真实记录了新中国初期留苏学子走过的艰辛道路和回国后对国家建设事业的贡献,对留学生派遣和管理体制也作了缜密细致的考察,对其利弊得失进行了客观评价。

正如本书指出的那样,“留苏潮”的兴起与新中国初期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外交战略的选择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抱着敌视态度,采取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政策,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则对新中国的建立表示热烈欢迎并给予大力支持。在此情况下,我国选择了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留苏潮”正是在中苏两国处于“蜜月期”这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但“蜜月”并不意味着两国绝对一致,毫无芥蒂。1950年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新中国建设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可靠的保障,但条约及其补充协定的有些条款含有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内容,显露了苏联的大国主义,为后来中苏同盟的破裂埋下了伏笔。“留苏潮”的终结是中苏关系由亲密友好到相互指责、最终走向激烈对抗的直接后果。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在中苏大论战中我们也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中苏分歧“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295页)关键的问题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我认为,也应该从这个视角来观察“留苏潮”终结的根本原因。

本书从多方面论述了“留苏潮”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巨大贡献。其最主要的贡献是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各条战线上都留下了这批留苏学子的足迹。在他们中间,有的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有的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和国防建设领头人;有的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有的成为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有的为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创新作出了贡献;有的成为著名的音乐家、戏剧家、画家和艺术史论专家。大多数留苏学子在各自岗位上勤勤恳恳,耕耘不辍,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祖国。他们促进了中苏(俄)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友谊与合作,成为人民友好的使者。

本书通过对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全面深入的考察得出结论认为,“留苏潮”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应该看到,它作为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具有某些局限性。由于“留学潮”是由政府统一领导和实施的公派出国留学运动,两国关系的变化对留学生派遣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留学生选拔工作中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有时把这一标准绝对化和简单化,致使某些学习成绩和个人品质都很优秀的学生因“家庭出身不好”或亲属存在某些历史问题而得不到出国机会,令人遗憾。此外,由于起初缺乏经验,选拔工作过于匆促,出国前的培训不足,致使有的学生出国后因语言不过关无法正常学习,只得中途辍学回国;在留苏生的专业选择和回国分配工作中,由于过分强调“服从组织分配”,没有充分考虑留学生本人的意愿和实际情况,以致出现一些学非所用的情况,造成了人才的浪费。由于留学派遣国过于单一,致使留苏生无法广泛接触和掌握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归国留苏生被戴上了“苏修特务”、“修正主义苗子”帽子,遭到批斗,有的甚至被关进监牢,受尽折磨。直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才得到平反。一些留苏学子虽然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遭受冤屈,但他们仍然怀着对祖国的赤子之心,无怨无悔地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迎来了出国留学的新高潮。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0 年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公布的资料,从 1978 年至 2009 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162.07 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 49.74 万人。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建国初期的“留苏潮”,不仅公派留学人数大幅增加,而且自费出国留学人员也迅速扩大。公派采取了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等多种形式,留学国度也出现多元化格局,不再像建国初期仅局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这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留学生派遣体制在不断改进和逐步完善,归国留学生在祖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振兴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

衷心希望新时期留学海外的青年学子继承并发扬老一代留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传统,努力学习并掌握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作出新贡献。

2012年2月于北京



## 绪论

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是近代世界各国之间为促进相互了解、加强教育文化交流、培养和储备本国各种高层次人才的战略性举措。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始于晚清时期。1872年8月,首批30名幼童从上海乘船驶向美国旧金山,开启了近代中国留学国外的先河。此后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出国留学的浪潮绵延不断。按照戴逸先生的划分,从留美幼童开始直至现在,近代中国留学生大体可以划分为十代。他认为,中国第一代留学生是1872年到1881年120名官派留美幼童,第二代是光绪初年(1877年)派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海军的近百人留学生,第三代是20世纪初的留日高潮,第四代是庚款留美生,第五代是留法勤工俭学,第六代是20世纪20年代留苏学生,第七代是从1927年到1937年期间的留学生,第八代是1938年到1948年期间赴欧、美的留学生,第九代是新中国50、60年代的留苏学生,第十代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留学高潮。<sup>①</sup>也有学者根据留学的不同背景和任务将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分为五个大的阶段。王辉耀先生认为,第一代留学生怀揣富国强兵之梦;第二代留学生充满热血革命的理想;第三代留学生有着科技救国的执著;第四代留学生肩负建设祖国的使命;第五代留学生充满创业立业的热诚。<sup>②</sup>新中国初期向

---

① 参见戴逸:《中国留学教育的光辉道路》,《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记事(代序)》,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② 参见王辉耀:《海归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浪潮,按照戴逸先生的观点,大致属于第九代留学生;而按照王辉耀先生的观点,则大致属于第四代。

应当说,新中国初期的留学高潮是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形成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被赶出大陆后,留下的是一个民生凋敝、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烂摊子。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面临的第一大历史任务,即取得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走上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继而担负起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第二大历史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完成后一个历史任务,比前一个历史任务更为长期、艰巨和困难,但又是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且,从共产党人所秉持的理论原则和意识形态看,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也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不仅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现代工业企业几近空白,不成体系,更为严重的是,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的专业建设人才十分匮乏,<sup>①</sup>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强调要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并开始筹划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更加剧了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然而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于是,除引进外国专家、吸收留学国外专门人才外,派遣学生赴国外留学,就成为加快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当时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采取极端敌视的立场和态度,新中国向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失去了可能。美国不仅自己在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还极力阻挠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同时,在经济上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给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处处设置障碍。在新中国专业建设人才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还竭力阻挠留学欧美的专家学者返回祖国大陆,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服务。<sup>②</sup> 因此,在与西方国家处于不正常

① 在1949年10月28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谈话中,陈云即指出:“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中的严重障碍是缺乏忠于人民政府且精通业务的技术干部。国民党留给新政府的只有2万名工程师和专家,他们大多数的政治信仰是反动的、亲美的。”他还以当时中国最大的鞍山炼钢公司的情况为例,说明中国技术干部的匮乏:在鞍山炼钢公司,70名工程师中有62名是敌视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敌视中国共产党人的日本人。(参见沈志华、李丹慧编:《中苏高层交往实录(1949—1965)——来自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学研究参考资料)2010年印刷。)

② 钱学森回国的艰难历程可以说是当时留美学生回国受阻的一个缩影。为了实现回国的愿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经历了5年多的磨难。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便有意早日回国服务。1950年夏末,钱学森将行李以及800公斤重的书籍、笔记本装上即将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轮,随即准备全家乘坐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回国。然而此时,美国已掀起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钱学森被无端地怀疑为共产党。根据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指示,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境。美国一位海军次长甚至咆哮道:“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回到中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极具军事价值的世界一流火箭专家回到“红色”的新中国。9月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钱学森,把他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进行残酷的折磨。后来,由于钱学森的抗议和美国友人的帮助,移民局不得不将其释放,但仍然对他进行监视。(转下页)

关系的状况之下,中国也就失去了向欧美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可能。而与此同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向新中国伸出友好和援助之手,首先在外交上承认了新中国,与新政权签订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对巩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革命胜利成果、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孤立和窒息新中国的阴谋以及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说,在当时苏联的经济实力已比较雄厚,科学技术文化发展方面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由于中苏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也视苏联为“老大哥”,这样,中国派遣大批青年学子留学苏联(和东欧国家),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文化及各行各业的管理经验,解决新中国专业建设人才十分匮乏的局面,就成为一种重要而又便捷的战略选择。而且,苏联为了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出发,对于接受中国留学生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苏联也真诚希望藉此在加强两国的联系和友谊的同时,通过为新中国培养人才而推动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而达到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目的。<sup>②</sup>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同时,还派遣了一大批专家来华帮助建设重要工程和传授其治国、治校、治厂的经验。尽管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来华的专家,但是,他们的工作在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仍然称得上是十分难得的帮助。

不论从哪种意义上说,这一次留学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高潮和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一次留学潮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留苏学生的选派、培训到政治审查和业务审查,从对留学生的留学期间的业务学习、政治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到学习期满后回国的工作分配,以及留学期间所有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承担,而苏联政府主要负责对中国留学生就读学校和专业的安排。由于当时青年学生革命激情高昂,“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成为留学生一切言行的准则,加上中苏两国

---

(接上页)美国当局的蛮横阻挡并没有锁住钱学森的归国之心,他继续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抗争。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后,钱学森便潜进行程控制论的研究,1954年在美国公开出版了30余万字的英文《工程控制论》。钱学森之所以进行这项研究,一方面是以此显示中国人在工程技术上的才华,另一方面则是要让美国当局看到他已经改变了原来致力喷气推进的研究方向,消除他们不让回中国的借口。1955年6月,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一封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恳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他回国。信件很快转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并亮出钱学森来信要求协助回国这一铁证,要求美国方面不再阻挠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回国。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参见钱学敏:《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在1949年10月—1950年12月期间,中苏两国领导人为了派遣中国留学生的相关事宜,进行过多次协商,足见对这一事项的重视。相关文件可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档案,一些非正式的谈话内容可参见沈志华、李丹慧编:《中苏高层交往实录(1949—1965)——来自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学研究参考资料)2010年印刷。

均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权力、资源都高度集中,使留学运动的全过程都成为“国家行为”,成为此次留学运动最为显著的特点。因此,这也使得这次留学潮具有了别样的意义,它不仅仅是教育史、留学生史、国际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国际关系史,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自1951年始,新中国向苏联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揭开了建国以后第一次留学高潮的大幕。从1951年至60年代中期,我国先后向苏联及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进修生和实习人员约18000名,其中,90%以上派往苏联,留苏学生(含实习生)约有16000多名。<sup>①</sup> 总体而言,一方面,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部门分布比较广泛,除教育部系统派遣的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外,机械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公安部、国防科工委等部委也相继派遣了一定数量的实习生。另一方面,留学生所学学科的种类也相当广泛,有工科、理科、师范、医农、艺术、法律、体育等,当然,由于国民经济恢复、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特殊需要,留学生所学学科更多地集中在国家建设急需的国防军事工业、特殊工种、冶金、化学工业、机械制造、地质勘探、交通运输等领域。此外,军队系统还单独派遣人员到苏联相关的军事院校和军事单位学习或进修。

从大的历史阶段看,这次留苏运动可谓是继20世纪初叶中国留学欧美、日本高潮之后的第二次留学高潮。这批留学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青年精英,他们被派往苏联有关高校攻读本科及研究生学位,学成回国后分配到相关单位为国家服务。尽管他们回国后不久,即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对于正处于青壮年时期的他们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他们为国家服务的抱负在那个“政治至上”的年代无法充分施展,他们的才华和精力无法全部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事业之中,而且在他们中间,有的因为中苏关系的恶化而受到无端的怀疑而得不到重用,有的因为发生了异国情恋而倍受情感和政治的双重折磨,有的因为对当时国内的政治运动持有不同的看法而感到迷惑与彷徨,甚至由此而导致原有的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和抱负的幻灭,所有这些,也造成他们的命运各异,人生发展道路各不相同,但是从整体上看,由于他们在国外留学期间,都是抱着振兴中华、为祖国崛起而勤奋求学的坚定理想,因此他们做到了认真刻苦,学有所成,并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本功,<sup>②</sup>因而他们在学成回国后大多成为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骨干,其中有200多人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不少人走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为国家建设事业和民族振兴发挥

①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五节。

② 正是由于这批留学生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能够做到勤奋、认真、刻苦学习,因此,大学生都能按期完成学业,研究生中相当一部分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少数人甚至获得了当时在苏联都很罕见的博士学位。同时,由于他们的良好表现,得到了留学国家的政府、教师、同学和民众的高度称赞,为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关系增添了绚丽的一笔。

了重大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留苏学生是新中国第一代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总结和分析他们的成长道路及其历史命运,既可为教育史、国际文化交流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留下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也对当今的留学生工作及选派、吸收海外智力资源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初期‘留苏潮’”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重大研究课题立项以来,我们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是查阅当年的档案资料。课题组成员先后到教育部、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大学及上海市档案馆搜集有关留苏学生选派、培训、管理、回国工作分配等档案资料。在此,对于教育部、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大学及上海市档案馆给予我们的种种便利和支持表示深深的感谢。教育部保存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档案比较齐全,而北京外国语大学档案馆所保存的留苏预备部关于留苏学生出国前的业务培训、政治审查及学员名录等资料更为完备。仅在这两个单位,我们课题组就摘录档案资料达50多万字,这对于我们完成本项目是弥足珍贵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以他们的热情和耐心,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此我们要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在这里我们还想说明的一点是,当课题组成员看到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些档案时是非常激动和兴奋的,然而在激动和兴奋之余,也有些许遗憾,那就是如此珍贵的档案资料却是尘封已久,很少有人查阅。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北京外国语大学档案馆保存着留苏预备部关于留苏学生出国前培训、政审及学员名录等详细资料,我们在查阅档案时,那里的工作人员曾向我们表达过希望学术界能够更多地利用这些档案进行学术研究的愿望,我们也真诚地希望这些愿望不至于落空。我们想,如果能够通过我们的编撰引起人们对这些档案的关注和研究,进而产生更多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白做。

第二方面,是搜集相关的学术著作和文章。通过各种渠道的搜集,我们发现,到目前为止,鲜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对新中国初期的“留苏潮”加以系统研究。虽然在教育史、冷战史领域,有一些学者从教育发展、中苏关系的角度对这次留苏运动加以研究,但是,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是研究论文)多为宏观的、定性的研究,引用的原始资料较少,无法从中全面了解留苏高潮的历史背景和相关的历史进程。<sup>①</sup> 而在国外

① 论文主要有:顾宁:《冷战年代中苏教育交流的启示》,《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黄利群:《建国初期留苏教育的历史地位评价》,《教育评论》2001年第2期;李涛:《关于建国初期留苏教育的历史考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2期;李涛:《关于建国以来中苏教育交流史研究状况的综合评述》,《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5年版第2期;李涛:《关于建国初期赴苏留学生派遣工作的历史考察》,《东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等。

对中苏问题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冷战背景下的中苏政治同盟、经济援助、军事合作等领域,对于新中国留苏学生这样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无论是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还是教育学角度,都尚未见到相关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这次“留苏潮”的纪实性回忆文章和书籍,在改革开放以后相继出版,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当事人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我们的研究。这些纪实性的回忆文章和书籍主要有:朱训主编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难忘的峥嵘岁月》(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3 年版)。这两本书是由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发起,征集新中国留苏学生(主要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少量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回忆文章整理而成。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还汇编了大型画册《学子之路——新中国留苏学生奋斗足迹》(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年版)。单刚、王英辉编写的《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通过采访 50 多位留苏学子整理而成,是一部较为详实的记录新中国留苏学生群体的纪实性作品。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常有当年的留苏学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回忆难忘的留苏岁月,在一些知名人士的传记里(如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等),也披露了不少留苏岁月的回忆资料。在教育史和留学史的著作和文章中,也有一些篇章或多或少涉及此次“留苏潮”,如宋健的《百年接力留学潮》(《科技日报》2003 年 1 月 30 日)、李滔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 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黄利群的《中国人留学苏(俄)百年史》(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丁晓禾的《中国百年留学全记录》(珠海出版社 1998 年版)等。这些作品虽然对留苏运动及留苏学生的生活有较多的介绍,但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缺乏对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全方位的阐述和评价,二是缺乏原始档案材料的支撑,从而影响作品的学理性和客观性。虽然李滔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 年以后)》一书中,有较为系统的关于建国初期留苏运动的档案资料,但是,部分档案资料经过编辑简略,不能相见全貌;同时,该书对于留苏学生出国前的培训工作以及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生活方面几乎没有涉及。应当说,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研究此次“留苏潮”的定位,进而明确了我们研究工作努力的方向。

第三方面,是访问当年的留苏学生。因为时隔半个世纪,当年 20 岁上下的青年学子,如今都已进入古稀之年,绝大多数人已经退休。留苏学生人数众多,年代久远,且分布地区广,各人经历不一,许多人工作岗位变动较大,再加上我们课题组人手、经费等限制,其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们放弃了进行普遍的调查访问的想法,而采取了抽样调查和个别访谈。根据预先的摸底排查,我们重点选择了北京、上海、南京三地。一方面,这三个城市的留苏学生比较集中,且交通便利,联络方便,为我们召集座谈会等活动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三地有较多的人脉资源,可

以为我们的调研活动提供一些便利。因此,在这里,我们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北京欧美同学会、上海欧美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相关机构和相关人员表示感谢,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无私帮助、参与和支持,才使得我们的调研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在上述机构和人员的协助下,课题组共举办座谈会计有15次(其中,北京4次,南京3次,上海8次),参加者约300余人次,个别访谈约50多次,其中,既有院士、教授、司局级干部,也有默默奉献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教师与科研人员。我们还利用座谈会和欧美同学会发放(或寄送)问卷调查表近千份,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问卷调查表回收不足200份。尽管如此,我们从这些回收的问卷中,在他们回答问题的字里行间,仍然能够感受到留苏学生在回忆起他们在苏联的岁月时的那种强烈情感,那种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那种与苏联老师和同学的深厚情谊。所有这些访谈资料,不但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感性素材,也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带有某种“抢救”的性质,增强了我们进行此项研究的动力。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为以后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教育史、国际文化交流史、国际关系史等方面的资料和思考,将是给予我们的最好的鼓励。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介绍即可以看出,本课题将主要运用如下几种研究方法:历史文献研究法、抽样调查法、访谈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当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遵循留苏运动的历史轨迹,以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为基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工具,力求做到系统、全面地介绍新中国初期“留苏潮”的国内外背景、发展进程、呈现出的特点、留学生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以及留苏学生归国后对国家建设事业做出的贡献,以还原此次“留苏潮”的全貌。并根据我们较为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对此次留学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作出评价和思考。

通常情况下,任何一次留学运动的潮起潮落、留学的任务与目的等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会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次的留苏运动也不例外。总体而言,它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初至50年代末,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留苏条件和环境表现得良好,中苏双方互不设防,这对于留苏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他们不仅可以获得良好的学习环境,而且在日常生活方面也能够得到苏方的照顾。具体地,中国官方选派大批品学兼优的青年学子赴苏留学,他们在留学期间学习勤奋,品行良好,大多数学生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优良成绩,获得苏方老师、同学的赞誉,也为回国后参加建设事业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苏联方面,所有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学校都开放各种

专业,苏联师生基本上能做到热情主动地帮助中国学生克服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困难,帮助他们尽可能快地掌握知识和本领,因此,中国学生与苏联导师、同学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第二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留苏学生的境遇因此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但中国官方派遣的留学生数量锐减,而且明确规定不再派遣留学生赴苏学习社会科学,与此同时,采取一定措施,加强对留学生的日常管理和纪律教育,规定留学生在遇到涉及中苏分歧问题的争论时应采取的态度和立场,等等。苏联官方则逐渐扩大了对中国留学生所学专业及实验场所的限制。中苏大论战开始后,尽管苏方仍接受原先达成协议的少量中国学生赴苏留学,但不准中国留学生涉足比较尖端的学科领域,甚至不准进入莫斯科等大城市,只能在较为僻远的高等学校就读。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决定召回所有派往外国的留学生,至此,留苏运动遂告中止。

历史翻过新的一页。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日趋正常化,当年的留苏学生的境遇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骨干,他们开始重温青年时代留苏的峥嵘岁月,寻找已经中断联系几十年的异国的老师和同学,在重建中苏(俄)两国人民之间友谊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一课题。我们在这里比较详细地梳理了半个世纪前“留苏潮”的全过程,对此次留学运动的社会背景、留苏学生的遴选、国内培训、思想政治教育、严格的政治审查、留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以及他们回国后对国家建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了全方位的汇集,并对其中若干关键问题作了理性的分析和思考。虽不能说我们的课题已做得十分完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们所运用的资料和所做的分析尽可能客观、实事求是。毫无疑问,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有许多可以开拓的空间,例如,可以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留苏预备部的学生生活加以审视,进而从中检视当代中国政治的走向;以及运用这一理论对留苏学生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进而演绎出中苏政治发展的异与同;可以从政治技术的角度对留苏预备部展开的政治审查加以考察,进而归纳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管理的规律等。当然,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那些有待开发的领域,将是我们今后研究工作努力的方向。



# 目录

序言/1

绪论/1

## 第一章 新中国“留苏潮”的兴起/1

第一节 “留苏潮”兴起的历史背景/1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的国家人才战略/4

一、全面接收旧中国科研机构 and 实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5

二、积极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工作和建设/7

三、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的决策/9

## 第二章 选派留苏学生的进程/13

第一节 新中国选派留苏学生序幕/13

一、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14

二、20 世纪 30—40 年代的留苏学生/16

三、“4821”留苏学生/20

第二节 1951 年新中国首次派遣留苏学生/30

一、新中国大规模留苏潮的开端/30

二、1951 年派遣留苏学生的特点/35

三、1951 年派遣留苏学生中存在的问题/38

第三节 选派留苏学生工作的全面展开/40

一、确定大规模派遣留苏学生的指导原则/40

二、1954—1956 年的留苏学生选派工作——严格审查,争取多派/48

三、1957—1960 年的留苏学生派遣工作——缩小规模,注重质量/53

第四节 20 世纪 60 年代选派留苏学生工作的延续